

## 商品經濟大潮下當代大陸知識份子的邊緣化

◎ 潘國靈

余英時提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邊緣化的論述，曾引起不少反應。<sup>1</sup> 所謂「邊緣化」，就是一種角色失落及錯置，知識份子逐漸從政治和文化中心位置退卻，不斷被邊緣化的命運。余氏在〈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一文中<sup>2</sup>，從二十世紀早期士大夫觀念徹底死亡，敘述至十年「文革」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邊緣化的全部完成。余氏說：「共產黨的歷史基本上便是一部邊緣人奔向權力的中心而知識份子則不斷被擠出中心的歷史」、「中共黨內自始至終都貫穿著一條知識份子靠邊站的規律。」<sup>3</sup>

可悲的是，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並沒有在毛後（Post-Mao）的中國劃上句號，而是以另一種不同的姿態繼續上演——知識份子沒有回歸中心的趨勢，反在一種社會經濟決定論的新氛圍下承受著另一種邊緣化的處境。

本文的重點便是勾勒出當代大陸知識份子在一般所說的商品大潮或消費主義下的生存狀況。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牽涉範圍甚廣，當下商品大潮所造成的衝擊，只能說是其面目之一；但縱觀80年代末至今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及文化表現，這確是不容忽視的。本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鋪陳事實，藉以勾勒出商品大潮下知識份子處境的輪廓面貌；第二部分剖析現象背後的意義，指出當代大陸知識份子在商品大潮下被邊緣化的命運，不僅是全球性消費主義的局面，更有其與中國特定歷史情境的糾結。

### 甲 商品大潮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處境

#### 一 知識份子的呼喊

許紀霖於1988年發表〈商品經濟與知識份子的生存危機〉一文<sup>4</sup>，開宗明義便發出沉重的呼喊：

當代中國的知識份子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生存挑戰。商品經濟的大潮以不可阻擋的氣勢席捲社會的每一角落，滌蕩著既存的價值觀念、生存準則和人際規範。人們彷彿突如其來地被拋出了久已習慣的生活軌道，愕然地注視著周圍陌生的一切。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神聖的校園，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寧的書齋，也難以再撫慰學者們一顆寂寞的心……

在該文中，許紀霖大致將知識份子分為兩類型——理論型知識份子和操作型知識份子——前者從事抽象價值符號系統的創造，包括理論科學和人文科學知識份子；後者則將抽象的價值符號轉換成具體的操作構思或產品模型。從性質來說，操作型知識份子可通過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市場需求而被納入商品經濟網絡；理論型知識份子則超越於現實的商品經濟之上。本來，這一超越性在任何國家都應予以尊重及保存，但正如許氏所說：「在實用理性仍然是我們這個民族普遍思維模式的時候，很容易在商品化的浪潮中將一切都納入功利的實用的框架，從而失去那份本應與世俗化相平衡的超越性。」<sup>5</sup> 在這種情況下，首當其衝的就是不直接產生任何直接經濟效益的理論型知識份子，人文知識份子在商品經濟下的生存危機尤其嚴峻。

有關商品大潮下中國知識份子的生存危機，往後在90年代的討論不絕。1992年，《中國時報周刊》發表一篇題為〈大陸知識份子日益邊緣化〉的文章<sup>6</sup>，其中副題就是——「鄧小平的開放改革，雖成功地走向商業化；但知識份子卻成了最受剝削的階級，日益邊緣化，文化日益沙漠化！」文中提到「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已降低到歷史最低點（上海市青年工人的平均月入已超過大多數教授），以及上海知識份子熬不住貧窮自1991年底以來紛紛集資以玩股票為第二職業的狀況。

1993年，復旦大學中文系陳思和教授與幾位學者舉行了一個「當代知識份子的價值規範」的研討會，研討會內容後來發表於《上海文學》<sup>7</sup>，當中不乏一些人文知識份子的自我觀感和內心剖白。其中，陳思和說：

我們面對的文化處境每況愈下，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與精神文化的萎靡不振形成一個強烈反差……這幾年經濟大潮起來，知識份子似乎連「責任感」也不再提，不敢提，或者不想提了。在日益見漲的消費水平與日益增多的經濟暴發戶面前，知識份子突然感到自慚形穢，知識份子在當代社會的形象就變得非常委瑣。

另一位與會者——當時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嚴鋒說：「眼下，似乎有一種新的『羞恥』感來到，這回卻不是直接針對知識本身，而是由於經濟地位而引起的了。許多知識份子在�其他社會階層前有點抬不起頭來。」總的來說，整個討論都流露著一種在商品潮下被邊緣化的悲觀情緒。

中國知識份子在商品經濟下的窘迫處境一直是90年代的話題，以至延續至去年北大百年校慶《明報月刊》發表〈商潮濤聲中的北大〉一文<sup>8</sup>，就不足為怪了。文中就市場經濟洪流對北大的衝擊，有頗詳細的描述。文中提到：「北大中青年教師的月工資不到一千元人民幣，只是北京出租汽車司機的四分之一。教學科研條件的簡陋落後，評定職稱的折騰內耗，令不少學者和教師，或離職下商海，或遠走去外國，或兼職創收入。北大已不再是精英人才願意棲居的伊甸園。誰能在如此的處境下靜心搞學問呢？」曾經是「四五」學生民主運動和「六四」天安門廣場事件的重要據點的北大「三角地」，今天成了商業宣傳廣告的據地。學生經商，學人下海，商潮氾濫，如文中所說：「早在九三年，北京市工商局披露，海淀區四十七所大學註冊的企業達六百零五家，而後起的北大佔一百家，僅排名在下商海開先河的清華大學的一百一十家之後」，其中「北大方正集團成了大陸最大的高校企業，是唯一在香港上市的大陸高校高科技企業集團」。誠然，學人下海並不全是負面的，亦有著將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正面意義，但最能直接參與其中的主要還是操作型知識份子，理論型知識份子的位置相對地便越加孤立和邊緣化了。

一個地方的民諺在相當程度上能反映現實處境。「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開張」、「窮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再窮也莫當老師」、「手術刀不如剃頭刀，原子彈不如茶葉蛋」等民諺；還有以北京大學為代表，在全國高校中曾喊起的一股「推倒圍牆向市場」、「推倒圍牆建市場」風潮（即北大南牆轟然推倒，被裝設華美的商場取而代之）、知識份子被嘲諷為「知識苦力」、「窮老十」（比文革時的「臭老九」還要低）等等，都側面說明商潮下知識份子的窘境。

有關知識份子在商品大潮下的生存危機，以上僅是一些例子。在文化層面上，文學亦出現商品化的轉型，以下就這方面加以闡述。

## 二 文學的商品化轉型

在《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一書中，談到90年代小說發展<sup>9</sup>：

90年代——文化重大轉變的時代；背景：（一）市場化進展加快，大眾傳播媒體迅速發展；（二）實用價值被普遍信奉，知識份子以「下海」（改行經商）為時髦之抉擇；（三）受消費文化的擠壓，文學退居文化邊緣。

1992年初，大陸作家馬原在《文藝爭鳴》發表了一篇題為〈小說百窘〉的文章，文中開首即問到：「在進入商品性文藝時代之後，原有的純文學還能通行多久？如果不改弦更張，我們還能把這碗飯吃下去嗎？」<sup>10</sup> 這並不是個別作家的無病呻吟，由80年代末滑入90年代，整個大陸文壇都意識到文學的商品化走向和衰落。唐翼明說：「從80年代末期開始，似乎有一些新的現象出現了，在文學方面，某種變化的跡象尤其來得明顯，例如從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一波接一波出現的文學潮流，作者與評論家對於旗幟與主義的熱衷，不同流派的集結與論戰等，到80年代末期頗有一種漸趨平靜、冷卻而進入某種混沌狀態之勢。」<sup>11</sup> 80年代喧嘩躁動一時先後出現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的蓬勃現象，一下子沉寂下來，風光不再。文學批評家如陳曉明、張頤武、王寧等宣布「新時期」<sup>12</sup>文學的終結，文學進入了一個「後新時期」的時代。「後新時期」最初以一個文學概念於1992年被提出來，在起始上雖存有分歧，但基本上是用以描述1989年以後「文學」漸趨商品化的轉型，當中標誌著「新時期」與「後新時期」文學之間的斷裂。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後期曾興盛一時的「新寫實主義」（neo-realist）小說。新寫實主義可視為「新時期」和「後新時期」文學的一個轉折點，在「新時期」文學失去轟動效應走向低谷的文學氛圍下出現。它一反之前先鋒文學在敘事和語言上的實驗性，標榜「還原生活本相」、表現「生活的原生態、生活流」、感情零度介入、中止判斷、淡化價值立場、消解意識形態等文學主張。<sup>13</sup>1989年南京文學雜誌《鍾山》特別推出「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得到許多著名作家如王蒙、劉恆的響應；1989年前後出現大批作品，如劉恆《伏羲伏羲》、蘇童《妻妾成群》（分別被張藝謀拍成電影《菊豆》及《大紅燈籠高高掛》）、池莉《煩惱人生》、劉震雲《一地雞毛》、方方《風景》、《行雲流水》等，一時蔚然成風。所謂表現「生活的原生態」，都以凡人瑣事成為寫作的中心題材，「常常突現生存環境的巨大壓力與莫可名狀的吞噬力，而小說裏的人物大多是生存困境的被動存在體。」<sup>14</sup> 新寫實小說一個共通的方程式，就是展現主人翁終日「為日常生計而張羅，……生存的這個概念已經沒有任何深奧的哲學內涵。生存也就是存活——想方設法地活著。池莉的一個短篇小說標題可

以看作一個象徵性的概括：〈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既寫生活困境，知識份子自然是上佳主角，方方的《行雲流水》就以一個典型窮教授為主角，將知識份子在商品大潮下的萎瑣、無力感、自卑感、精神失落寫得非常深刻。

這種對文學深度的削平，只寫毛茸茸的生活層面，正好反映當時消費主義主導的社會意識形態。回頭檢視，「新寫實主義」的曇花一現，很大程度上得到文學批評界的推波助瀾，但這亦是大陸文壇最後的一次「垂死掙扎」。進入90年代，再沒有甚麼浪潮可被颳起，「文壇所發生的一切爭論、風波和重大熱點無一不是與消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譬如王朔「痞子文學」現象、稿酬風波、作家下海等。<sup>16</sup>再至千禧年後，一輪輪由上海女作家衛慧、棉棉帶起的女作家私小說風、以韓寒為首的低齡寫作風、網絡文學風、青春殘酷小說《北京娃娃》等風潮，主要由出版社和大眾媒體擔當舵手，鼓動轟然的媒體效應和速銷現象，至於文學商品化已成普遍社會現象。

在消費主義氛圍下，作家紛紛下海，一時成為頗矚目的現象。文壇驍將張賢亮、陸志文、謔容、程賢章、胡萬春紛紛下海；以小說《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而享譽文壇的張賢亮，公開發表〈我們面臨著一次歷史的轉機——文化型商人宣言〉，其中不乏豪情壯語，如「中國的文化只有在堅實的經濟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中國的文化人只有參與經濟生活才能干預社會生活……我們要在中國的市場上面展開優美的『托馬斯全旋！』」他以極快速度在寧夏文聯名下開辦了藝海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和寧夏商業信息有限公司做其董事長，下海才兩個月已籌集資金一百萬；「作家的一半是商人」，一時成為佳話。<sup>17</sup>一是下海從商脫去作家外殼，不然即被商海大潮沖向邊緣，作家一時陷入非此即彼的兩難處境，這亦是不少人文知識份子的生存狀況。

## 乙、商品經濟大潮之意義剖析

### 一 後現代性

中國商品大潮的衝擊，是否可簡單還原為「錢作怪」三個字呢？從某角度看，消費主義、理論型與操作型知識份子分化、理論型知識份子被邊緣化、文化商品化和庸俗化，都是後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而不獨為中國所有。

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他著名的《後現代狀況：有關知識之研究報告》（*Condition postmoderne*）一書中，對「知識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 of knowledge）就有頗多的描述，譬如「知識供應者與使用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漸漸趨向商品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供需型態，而且會愈演愈烈，這也就是說，其型態將以價值模式為歸依……知識不再以知識本身為最高目的。知識失去了其『傳統價值』」、「知識以資訊商品的型態出現，成為生產力不可或缺的要件，在全世界的權力爭霸戰中，已成為最主要的籌碼，而且會變本加厲，愈演愈烈」。<sup>18</sup>但知識商品化主要是針對技術知識份子（technical intelligentsia）和「專業知識份子」（professional intelligentsia）而言；相反，人文知識份子（李歐塔用的是"liberal elite"一詞）卻漸趨邊緣化；這在該書的第十二章有頗詳細的描述。<sup>19</sup>正是在這個前提下，李歐塔提出知識由昔日的「自我合法化」轉向「運作效能合法化」（legitimation by performativity）。以上提到許紀霖描述實用理性主導、操作型知識份子和理論型知識份子的不同狀況，基本上與李歐塔所言一致。

至於文化商品化，不少研究後現代的學者如哈維（David Harvey）、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都有所論及，其中詹明信在《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書中，試圖找出後現代文化與社會經濟狀況演變的關係。他認為，在發展至第三階段的「晚期資本主義」或「跨國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中，文化主要特徵是「無深層意義」（depthlessness）、文化商品化，正如他說：「今日的美學生產已經被併入商品生產：以更大的翻新速度去生產更新奇的商品。」<sup>20</sup>

這裏並不是要對後現代文化、知識狀況作深入的討論，以上所說，旨在點出本文第一部分敘述的商品大潮下知識份子的處境和文化轉型，從表明看來，似乎與後現代性有一定的呼應關係。事實上，以上提到的「後新時期」，最初雖以一文學概念提出來，但「到了1994年，王寧和張頤武對『後新時期』理論作出進一步解釋的時候，更強調這個概念的『文化性』和與『後現代』的聯繫。」<sup>21</sup> 正如《90年代的「後學」論爭》一書中指出：「後學（在中國）最為活躍的時期集中在1992–1993年，那個時期正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的時期，中國的政治氛圍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商業化以及與之伴隨的消費主義成為主導性的社會意識形態」<sup>22</sup>；在時間上這恰恰呼應「後新時期」的提出。這樣看來，若以「後新時期」標誌著中國商品大潮的到來和由之而起的文化轉型，這的確含有一定的後現代性。

但必須指出，雖然後現代性含有一定「全球性」的普遍意涵，若以此將中國商品大潮及當中知識份子狀況看作一全球性普遍現象，而忽略了其與中國特定情境的複雜微妙的關係，則便過於簡化，甚至有扭曲之嫌；蓋中國文化界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並不是單純譯介西方的思潮，而更是基於自身現狀的人文闡釋；百年以來西方思潮的引入都是如此發生的。調侃一點的說，如果中國實踐的是鄧小平所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文所探討的商品大潮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同樣是有其「中國特色」的。雖然它以一種非歷史性的面貌出現，實則它仍受一隻歷史黑手擺布，可放於鄧小平的毛澤東主義「去激進化」（deradicalization）或「非毛化」脈絡中梳理剖析。

## 二 中國特定歷史情境

1978年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重返政壇，展開「四個現代化」的經濟計劃。鄧小平以實事求是見稱，他於1962年早說出家喻戶曉的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被認為是一個重視實效的實用主義者。這固然代表鄧小平的個人思想，但「實用主義」也有其客觀的政治針對性和功能，正如金耀基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認識論假設被提升為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原理。這樣，毛澤東思想就不再是衡量一切的標準了，相反，它本身也成了一個有待於檢驗和評判的對象。」<sup>23</sup> 「實用主義」思維不僅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十全會中鬥倒了華國鋒的「凡是派」（凡是毛說的都對，都不能改變），更以巧妙的姿態展開了「非毛化」的開始。

所謂「四個現代化」，指的就是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其內容離不開糾纏近代中國百多年的「富強」二字，是「一場旨在發展生產力的『第二次革命』」<sup>24</sup>，至於文化、觀念、教育、政治的現代化則一一從缺。以後不斷倡議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都離不開這種「發育不平衡」的經濟現代化。鄧小平的實用主義一直充當經濟改革的後盾，廣泛化為宣傳口號；1991年初鄧小平視察上海時說：

「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不管姓資姓社」成為「好貓主義」的新表述。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已不僅是他個人的做事方針，更強化滲透成一種社會價值標準。在這種思維模式的領導下，操作型知識份子被納入商品經濟網絡，理論型知識份子被擠於邊緣，兩者的分化，自然得到充份的社會發展條件。

將中國商品大潮或消費主義放在中共歷史脈絡來看，*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一書有頗具洞見的分析。<sup>25</sup>此書指出，毛澤東時代「不斷革命」的烏托邦主義鼓動或賦予人民對未來的高漲意識（heightened consciousness），隨著烏托邦的死亡，人民一下子跌入價值真空的虛無主義（nihilism）狀態，這不僅是「意義的不在」（absence of meaning）而更是「意義的消失」（disappearance of meaning），一種從高處墮下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就是一種藉著享樂主義（hedonism）來克服或轉移虛無主義的手段，藉享樂主義提供一條拐過重新找尋意義的考驗折磨而填補虛無主義真空的出路。書中所用的“hedonism”，當然不是原本出自希臘哲學的一種幸福論，而是一種鼓吹追求財富物欲的經濟主義。此書作者亦提到，八九天安門廣場事件最初的觸發動因正是反官僚貪污腐敗多於自由民主口號，從某角度看，就是著眼於經濟利益的不平等、被剝削和壟斷。<sup>26</sup>八九事件後不久，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的改革思想被尊崇為『鄧小平理論』，至此虛無主義向享樂主義的轉化或反昇華（de-sublimation）大致完成。「後新時期」概念在這個時間被提出來，並不是偶然的。

進入90年代，商品經濟大潮氾濫，與其說這是經濟改革失控，還不如說這是黨國政體所允許並在背後一直參與指揮的。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中國社會「去意識形態」的發展，譬如陳曉明說<sup>27</sup>：

一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間社會趨於形成，這個日益壯大的社會正在擺脫意識形態而自行其是，經濟實利主義實際已經成為當今社會價值準則和生活要義。

但弔詭的是，表面自行其是的經濟實利主義，實則仍由黨國體制在背後撐腰並合法化（legitimized）。與其說是「意識形態消解」，還不如說是「意識形態工程」（ideological engineering）的重建工作，經濟實利主義被提昇為新的國家意識形態。這可以放在阿爾圖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框架來加以理解。<sup>28</sup>籠統地說，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思想在相當程度是通過「國家霸權」（state hegemony）下的「壓制性國家機構」（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以壓制或暴力手段如連綿不絕的思想改造、政治批鬥、政治整肅來傳播。在鄧小平時代的「非毛化」過程中，經濟實利主義更多是以一種隱然的「意識形態國家機構」（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滲透，人民被「詢喚」（interpellate）、自覺以「自由主體」（free agent）將社會意識形態內在化；此所以才有「去意識形態」之感。

經濟實利主義佔著主導的意識形態地位，正如邁斯納（Maurice J. Meisner）所說：「與毛相反，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將生產力置於生產關係之前，認為歷史發展變化的動力是經濟發展而非階級鬥爭。」<sup>29</sup>不僅如此，經濟生產力還似乎被本末倒置當成歷史目的，如邁斯納所觀察：「毛在世時，毛主義的特點是致力於調解現代經濟發展手段（means）和社會主義目標（ends）之間的矛盾；而毛之後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卻對此隻字不提……在經

濟發展過程中，發展經濟的手段變得越來越像最終目的了。」<sup>30</sup> 在這種情況下，置身於商品經濟中心之外的人文知識份子，由於不直接參與商品經濟建設，意味著其製造歷史動因及參與推進歷史目的之價值皆被否定，其無力感之大可以想像；加上待遇偏低日趨貧困化，他們同時承受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危機。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在激烈的「反智主義」下知識份子被壓制、改造、牢牢抓緊；毛後知識份子便走上了被放逐的命運，遠離權力中心，變成反諷的「無所依傍的知識份子」

(unattached intellectuals)。在五四時期，人文知識份子扮演啟蒙者和人民的代言人；在毛澤東時代，一個反轉成了被啟蒙者和被教育者，要向工農兵學習；到了毛後時期，他們彷彿變成了向牆壁獨白的自言自語者，一如陳思和說<sup>31</sup>：

隨著市場經濟的衝擊，知識份子幻想的「廣場」早已不復存在，「廣場」改建成了貿易集市，大眾沉醉在商品崇拜之中，到處是嚷嚷吵吵，再也沒有誰來聽你指手劃腳地說教了。激情不消自退，知識者恐怕又經歷了一個從政治文化中心摔向邊緣的過程。雖然這個中心是虛擬的，但失落感顯然是超過了知識份子的心理承受力。

但也必須指出，雖然鄧小平一上場即提出四個現代化，商品大潮、市場經濟效益並不是一下子便到來，跟「非毛化」進程一樣，是漸進而需時的。文化商品化也不是一下子到來，而是到80年代末才明顯出現轉型面貌。這樣，或可理解何以在經濟主義意識形態下，80年代中期前後曾出現過一陣的「文化熱」，好一片文化多元的景觀。這固然可以理解為在排脫了毛澤東時代文化極權主義，而經濟主義意識形態還未至滲透程度之下，文化得以倖存一線自由發展的空隙。但我想提出的是，「文化熱」不僅是在這種消極情況下出現，實際上它更積極參與著「非毛化」進程而為當時的政權所允許。這點，可以落於「新時期」文學發展中加以闡釋。

### 三 文學商品化之前夕

「新時期」文學的確熱鬧非常，1977至1986年之間先後出現一浪接一浪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唐翼明提出了以「反叛」作為貫徹起這此起彼落文學現象的線索，頗有說服力。<sup>32</sup> 但說到底，反叛的對象是甚麼呢？在「四人幫」粉碎後出現的傷痕文學（著名作品有劉心武《班主任》、諶容《人到中年》等），一言蔽之，反叛矛頭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揭露十年內亂造成中國人民深刻傷痕的歷史悲劇。反思文學是傷痕文學的深化和延續（著名作品有茹志鵬《剪輯錯了的故事》、高曉聲《李順大造屋》、古華《芙蓉鎮》、王蒙《蝴蝶》、張賢亮《靈與肉》等），時間上它跳出了文革的桎梏，思想上不再停留在傷痕的刮露，而對中共幾十年來走過的路進行反思。傷痕揭過了，反思歷史做過了，隨之便是向前看探索面前的「改革」道路，「改革文學」正適時而起，作品雖反映四化建設中的矛盾和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但總的來說，就是提出改革的迫切性、艱難性、不可逆轉性。尋根文學的出現（著名作品有韓少功《爸爸爸》、阿城《樹王》、莫言《白狗鞦韆架》、王安憶《小鮑壯》等），標誌著由政治反思進入文化反思。尋根作品張揚民族文化的強而有力，淡化現實政治和共產黨三十多年統治的印跡。傳統民族文化在毛時期特別是文革中被否定破壞，這回在文學中再度登場。至於先鋒文學，則進一步脫離政治文化層面，從表現手法及語言敘述上進行顛覆，一反文學多年來在「文學必須從屬政治」、「文學必須為工農兵服務」的綱領下造成的僵化。

以上扼要的勾勒，不難看出所謂「反叛」，其矛頭是「過去式」的。撇開文學自身發展規律不談，新時期文學與鄧小平時代的「非毛化」是並行不悖的，甚至相輔相成。作家或文化工作者自覺或不覺地參與了「非毛化」工作；難怪文學評論家趙毅衡說<sup>33</sup>：

新時期文學，與廿世紀中國文學的大部分時期相同，服務於主流社會運轉的需要，服務於政治運動，寓教於樂、製造典型。因此有所謂工業文學、農業文學、合作化文學、傷痕文學、改革文學……。主流社會運轉過程中，文學被徵用作潤滑油。

殘酷的是，當社會擺脫了毛澤東思想的陰影和羈絆，當經濟實利主義經十年改革強化為社會意識形態後，作家或文化工作者在改革時期的「文化革新者」任務完成，隨即便被「商品大潮」吸納吞噬。80年代社會不錯曾出現思想解放，但不過是從毛澤東思想中解放出來，文學批判矛頭只可對準過去，從無機會對準現存的政治體制。文學商品化雖說是全球性的後現代現象，在中國卻是走了這樣的迂迴道路。人文知識份子一再被「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在一切以經濟為主要的思想下，文化、社會各方面被統攝其下、文學商品化等現象不過是「經濟發展、其他收緊」邏輯發展至某階段的必然結果。不僅如此，社會裡似乎出現了一種「經濟簡約主義」的聲音，萬事皆以經濟二字詮釋——「社會主義」等同於現代化和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對一般人民來說，自由平等就是追求經濟財富的自由平等機會，都是一些例子。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就人民內部矛盾的一段內部講話，正好印證這種說法。據他所說，人民內部矛盾幾個主要因素是<sup>34</sup>：

企業領導班子作風不廉潔，企業搞不好，領導貪污受賄；企業領導作風不正，企業發不出工資，領導卻大吃大喝，花天酒地，公款買房子、汽車；處理下崗職工不公正，少數人說了算，不考慮職工的利益；領導幹部不關心職工的困難，不保障基本生活，以致發生悲劇。

當真如此的話，社會人民全都變成經濟主體而已。中國當代知識份子若不想被削平為經濟「一次元人」（one-dimensional men），除了成為孤立的邊緣知識遊魂，是否有別的選擇？

## 註釋

- 1 余英時：〈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二十一世紀》1990年12月第二期，頁5-7。
- 2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1992），頁33-50；此文原發表於《二十一世紀》1991年8月第6期，頁15-25。
- 3 同前註，頁43-44。
- 4 〈商品經濟與知識份子的生存危機〉，《讀書》，1998年9月，頁5-11；此文後收於許紀霖：《精神的煉獄——文化變遷中的中國知識份子》（香港：三聯書店，1992），頁80-89。本文引頁數以後者為據。
- 5 同前註，頁83。
- 6 傅鏗：〈大陸知識份子日益邊緣化〉，《中國時報周刊》，第四十期（1992年10月4日），頁66-67。
- 7 〈當代知識份子的價值規範〉，《上海文學》，1993年7月，頁67-71。
- 8 江迅：〈商潮濤聲中的北大〉，《明報月刊》1998年6月，頁25-27。

- 9 皮述民、邱燮友、馬森、楊昌年：《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台北：駱駝出版社，1997），頁494。
- 10 引自程德培：〈消費文學——商品消費大潮衝擊下的新時期文學分期〉，收於邵玉銘等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台北：聯合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95），頁368。
- 11 唐翼明：《大陸「新寫實小說」》（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頁3-4。
- 12 「新時期」不純粹是文學術語，含有政治分期意味，一般從1977年，即毛澤東死後「文革」結束次年算起，至1989年而止。
- 13 註11唐翼明，頁21-24。
- 14 馬相武編：《東方生活流——新寫實小說精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3），頁1。
- 15 註10《四十年來中國文學》，頁378。
- 16 同前註，頁378-9。
- 17 魏風主編：《中國知識界大震蕩——商海沉浮中的中國知識份子掃描》（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頁1-17。
- 18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4-5; 中文翻譯取自羅青：《什甚是後現代主義》（台北：學生書局，1989），頁161-2。
- 19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47-53。
- 20 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著、吳美真譯：《後現代主義或晚期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台北：時報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23。
- 21 徐賁：〈甚麼是中國的後新時期〉，《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號，頁75。
- 22 汪暉、余國良編：《90年代的「後學」論爭》（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vi。
- 23 金耀基：《中國政治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87。
- 24 同前註，頁86。
- 25 Ci Jiwe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26 同前註，頁8。
- 27 陳曉明：〈反抗危機：「新寫實論」〉，載氏編：《中國新寫實小說精選》（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頁2。
- 28 Louis Althusser, excerpts fro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A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Reader*, ed. Anthony Easthope and Kate McGow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2), 50-58.
- 29 Maurice J. Meisner, *Marxism, Moa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232; 中譯取自《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237。
- 30 同前註，頁234（中譯本為頁240）。
- 31 陳思和：〈知識份子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還原民間》（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34。
- 32 註11唐翼明，頁6-14。
- 33 註10《四十年來中國文學》，頁372。
- 34 《明報》，1999年1月4日，「中國要聞」版。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五期（2003年6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